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三卷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III

中华书局，2001年6月

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几点观察

陈弱水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

摘要：这篇文章讨论了中晚唐至五代时期福建士人社会阶层的兴起，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思想历程。作者希望这个考察不但有助于展现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的若干特色，而且能对当时知识界的整体结构有所揭示。作者从观察中得出如下结论：（1）科举制度是沟通地方性与全国性士人社群的最重要管道，在唐亡前一个多世纪，闽士在此管道备受压抑，一直只有「孤寒平人」的身分。这个景况一方面反映了福建士人作为新兴社群的边缘地位，但另一方面，他们以及其它南方新兴地域士人受到压制一事，事实上显现了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力量的茁壮。（2）在地方性与中央性士人社群之间，有无介于两者之间的区域文化中心，这个现象似乎显示，唐代以后，科举与文人仕宦制度对中国士人社群的结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3）中晚唐的福建省学者，颇有人服膺安史乱后出现的新儒家思潮。

关键词：福建士人阶层；科举制度；官僚体制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这篇文稿试图透过对一个新兴地方知识阶层的观察，探测中晚唐五代中国士人文化界的社结构。由于处理的是一个小小个案，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很有限度。

晚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化时代。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则为南方的兴起与北方的相对衰落。在这段时期，南方许多向来处于汉人文化边缘位置的地域，文化和经济急速发达；传统的核心地区如吴地、杭越，重要性也不断增加。整体而言，我们可以说，南方——尤其是东南——自此取代黄河流域中游，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重心，直到近代。

今天的福建（唐代多称闽、闽中），就是一个在晚唐五代有急速发展的地区。直到八世纪末，福建还从来没有出现任何具有广泛知名度的知识分子，但在往后的两个世纪，这里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知识阶层，到北宋，已是中国最主要的士人文化区之一。学者统计，北宋一代，福建路共中进士 2,600 名，居全国之冠，远多于第二位的两浙西路。两浙西路即南方传统文化核心区三吴之地（苏州、常州、湖州等），有进士 1,444 名。事实上，北宋福建进士的数目，超过浙东、浙西的总和。这个惊人的变化，无疑与闽中士人在晚唐五代的崛起有关。¹

本文的目的在考察福建士人阶层从中唐到五代兴起时的状况。在中国中古，知识阶层并不限于士人，佛僧和道士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晚唐的福建又是佛教发达地区，僧侣在当地扮有重要的文化角色。不过，由于题旨所限，个人无法对福建知识界中的佛教成分进行系统的探讨，只能在结语中简略提及一二。本文的重点将放在闽中儒士与其它地区——包括京城——士人社群的关系。个人希望，这个考察不但有助于展现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的若干特色，也能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整体结构有所揭示。这样的探讨，或许还能增加我们对唐宋变迁的了解，也未可知。

福建士人阶层兴起过程中所见的中央与地方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泉州莆田人林藻中进士，次年泉州晋江人欧阳詹（去世于802？）也进士及第。²自此，福建士人透过科举考试，闻名知识界的越来越多，成为晚唐士人群中一股明显的力量。唐人以及后代学者因此多将德宗朝视为闽人中举之始。本文提出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课题，也许会有人把闽人大量中举入仕之事与这个课题等同起来。严格来说，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闽人在八世纪末连中进士，的确标志着他们进入中央性或全国性知识界的开端，但闽地前此一定已有颇具根基的士人文化，否则无法培养出能在科举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人才。本节的目的，就是在考察福建士人从一个纯地方性社群演变为全国性知识界的组成分子之过程中的种种面相，希望藉此展现唐代一个区域与中央互动的个案。

现在要为本文经常出现的两个词语下定义：中央性知识界与全国性知识界。在本文中，两者指的是同一社群。称为中央性，是因为这个社群以首都长安为活动核心，华北文化中心洛阳似乎是这个社群的副核心。但中央性知识界的成员经常到全国各地当官或参访，实际的结构是一个网络，长安或洛阳是这些成员联络与思念的交集点。就这个社群的广大网络性质而言，也可以定名为全国性知识界。在本文中，这两个词语将交互使用，不作区别。

传统的说法认为，闽人中举是从德宗贞元年间开始，经过后代学者的研究，证实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不少文献记载，中宗神龙二年（706）进士薛令之就是福州长溪人。此外，林藻的父亲林披于天宝十二载（753）登进士第，在此之前似乎还中过明经。这些资料也许有个别的错误，但福建人士在安史乱前有人登第应该是没有疑问的。³应该注意，这类事例非常零星，闽人在全国性知识界的崛起，不得不归于贞元年以后。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在闽人进入中央性士人社群之前，地方知识界的情况如何？闽人大量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与中央型的士人有怎样的接触？

可以想象，唐代中叶以前，闽地知识界的资料是极其稀少的。不过，这个群体的存在还是可以得到证明。晚唐五代的福建文宗黄滔（莆田人）编有《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说此书是：「编闽人诗，自武德尽天佑末」，⁴换言之，是有唐一代的闽人诗选。此书早佚，我们无从猜测其中有多少唐中叶以前的诗，但从《新唐书》的按语判断，或许不仅零星数首。此书的存在，似乎显示在林藻、欧阳詹等人以前，闽地已有相当活跃的士人文化。至少我们知道，有诗人的作品得到抄写流传。

从黄滔的其它著作，我们也发现两位早期福建士人的资料。〈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叙述，开元寺的前身是龙兴寺，再早则为莲花道场，本是「郡儒黄守恭」的宅第，于武后垂拱三年（688）捐献。开元寺目前尚存，在晋江县。又，〈莆山灵岩寺碑铭〉说，灵岩寺原为「梁陈间邑儒荜阳郑生」的家宅，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捐为金仙院。此寺应在莆田的郊外。⁵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两位「儒」有何等的素养或成就，但他们应该都是读书人。值得注意的是，郑、黄两人显然都是地方富家，有大宅可供施舍。似乎到晚唐，福建士人的社会背景也还是当地盛族。

不过，中唐以前的闽地士人文化也不至于很兴盛——至少从晚唐闽士的观点看来是如此。黄滔的从兄黄璞着有《闽川名士传》，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的解说，该书所记人物，「自薛令之而下，凡五十四人」。⁶前文已提及，令之是中宗神龙二年进士。黄璞的选择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名士」标准深受唐代科举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显示，他对初唐闽地士人文化的评价不高，必须以进士为记载的起点。

至于闽人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前该地士人与中央知识界的关系，大体来说，彼此的接触是存在的，途径大约有二。最明显而主要的是，两者在福建本地的交往。唐代朝廷派驻闽中的官员、他们的僚佐以及若干流寓福建的中央型士人，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外来的知识社群。物以类聚，这个社群的成员自然会设法与当地士人联系，这就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接触。在唐代，这是一种常见的中央与地方的文化关系，至少普遍存在于南方各地。以下以欧阳詹的经验为例，揭示此一现象。

韩愈的〈欧阳生哀辞〉有言：

今上初，故宰相常袞为福建诸州观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辞进，有名于时，又作大官，临莅其民。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袞亲与之为客主之礼。观游宴飧，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詹于时独秀出，袞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⁷

韩愈说，常袞在福建倡导文学，礼待读书人，「时未几，皆化翕然」，带有明显的中央观点，可能对地方的情形想象得太简单。不过，这段文字也含有重要的事实，如欧阳詹在闽中受到本地同侪的推重、常袞的擢拔，都可以从欧阳詹的〈与王式书〉获得印证。⁸欧阳的这封信对他自幼成学乃至赴京考试的经过叙述颇详，值得介绍。欧阳詹文才早发，很得同侪的看重，从二十一岁时起，就有朋友鼓励他考进士，并传布这个想法。他们是：「濮阳仲宣、河东千龄、荥阳从易、济北有融、琅琊次臣」，据欧阳詹自注，以上诸人依次为吴播、薛寿、郑简、康暉、王云卿，都是同乡。王式既是同乡，也在劝说者之列。后来，德宗建中年（780—3）初，由于常袞和泉州刺史薛播约谈，欧阳詹考进士的计画才变得具体。⁹最后的决定是在欧阳詹的父亲与王式等人商讨后，正式作成。根据欧阳詹的描述，他考进士最先是由友朋鼓动，常袞接礼已在好几年之后，最后父亲也介入。在这个过程中，常袞等朝廷派任的官员一定与地方士人颇有往来商议。值得注意的是，常袞任职福建观察使是在建中元年至四年初，¹⁰欧阳詹开始赴京考进士，大约在贞元三年，常袞早已卸职。此外，欧阳詹参加贡举的过程也透露，在八世纪晚期，一个福建士人要决定是否尝试进入全国知识界，入仕朝廷，的确是件大事。

常袞与地方知识界交往应该不是特殊的现象。现以欧阳詹的〈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为例说明。¹¹欧阳詹此文作于贞元九年（793），中进士的次年。文章记述泉州刺史席相（贞元七年至九年在任）在东湖宴请该年泉州赴京考科举的八人之事。¹²欧阳詹没有记载这八人的名字，倒提及四位即席赋诗的陪客：「天水姜阅、河东裴参和、颍川陈诩、邑人济阳蔡沼」，欧阳自己也是陪客。欧阳以外的四位客人中，蔡沼当然是泉州人。陈诩也是闽人，福州闽县人。姜阅、裴参和的背景为何，则无法获知。这里要提出两点观察。首先，晚唐五代的福建士人有清楚的地方意识，我们相当容易得知他们的乡里。不过，在行文间，他们还是常以郡望自称或称呼他人，前引〈与王式书〉就是显例，我们不可径据这种称呼，以某人为流寓之士。当然，闽人的郡望，出于依托者恐怕不少，也难以细考。其次，陈诩在贞元十三年（797）进士及第，¹³九年时，大约还是一介平民，席相仍以客待之。蔡沼似乎先于欧阳詹以明经及第，当时已有出身。¹⁴他们两人——至少陈诩——参加宴席，应该也能算是朝廷命官与闽地知识界交往的一个例证。

此外，比常袞稍早任福建观察使（大历七年至十年，772-775）的李椅，据说也提倡儒术。中唐古文名家独孤及的〈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并序〉说，「闽中无儒学，成公（李椅谥号）至而俗易」，又称美他修建学校，「以五经训民，考教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祈祈，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¹⁵这些描述过于抽象，也嫌夸大，但的确透露某些地方首长积极与地方读书人接触的情况。

闽人大量参加科举前，福建士人与中央的连系，还有一条途径，就是以其它方式担任朝廷命官。关于这个途径，林藻家族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林家可说是福建的儒术世家，林宝的《元和姓纂》已列举，称作晋安林氏。¹⁶林藻于贞元七年登进士第，二哥林蕴贞元四年明经，父亲林披更早在天宝十二载考上进士。更重要的是，林家早有先祖进入中央政府的系统。根据林蕴的〈睦州刺史府君神道碑〉，林家兄弟的曾祖林元泰曾任瀛州刺史（治所在今河北河间），祖父林万宠也曾为刺史。¹⁷林元泰担任瀛州刺史的时间估计在睿宗时（710—12）。我们不知道林家祖先是入仕的，但刺史是重要的地方文官，元泰、万宠能任此职，应有相当的教育程度。还有一项记载说，林披有九子，八人曾任刺史或司马，一人为处士，世称「九牧」。¹⁸由上述资料可以察知，至迟从七、八世纪之交，林家就不断出现朝廷命官，在这个过程，必然与全国性的士人社群发生密切接触，以至到八世纪晚期，已成为官僚家族了。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判断，林家是第一个成为全国性知识界成员的福建家族。

欧阳詹也曾为一位非依贡举途径入仕的闽人撰写墓志铭。此人姓杨，已不知其名。曾祖以下都在闽广一带任州县佐官。杨某则北上入仕，长期担任军事幕僚，生前的最后一个职位是鄂州司仓参军。杨某一生的官阶虽然与父祖差不多，都是地方僚佐，但有一个重要差别：他是由吏部所选用，属于中央政府的系统。从经历看来，他的父祖们显然为南方地方长官自己任用，不经吏部，或属于南方特有的任官制度——「南选」。¹⁹根据欧阳詹的描述，杨某是一位实务型的知识分子，「六籍外，偏好穰苴管子之术」，虽然不是经生或文章之士，似乎也是士人社群中人。杨某于贞元十二年（796）去世，宦途凡三十一年，换言之，代宗永泰年间（765—6）开始任官。墓志铭说他，「永泰中，以耕战之法，致梁宋军」，可见一出仕就是北宦。在杨某任官期间，闽人科举登第者极少，他和林藻家先祖代表的，应该也是一种地方与中央文化接触的管道。²⁰

接下来，要讨论德宗贞元年以后闽中士人与中央的关系。从贞元年到唐末，福建士人继续在家乡与外地来的中央型士人有大量接触；个人虽然尚未看到任何实例，闽人依科举以外途径入仕朝廷的，应该也还有。不过，由于闽人大量贡举登第，科举考试的过程以及往后的任官，成为他们进入全国性士人社群的最重要途径；也因此一管道的开辟，许多福建人士在唐代文化界崭露头角。关于福建地方与中央的这层新关系，以下要提出两点观察。

首先，福建士人在求举入仕的过程中，艰辛倍尝，有深刻的边缘感，他们在晚唐科举系统，是属于「孤寒」或「寒俊」的位置。以下主要利用欧阳詹和黄滔的遗文，略作揭露。欧阳詹〈上郑相公书〉有言：

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踰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犹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耕耘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沾。²¹

〈上郑相公书〉应是欧阳詹于贞元十五年（799）任四门助教时所写，「郑相公」为当时宰相郑余庆。²²此信的目的是祈求擢拔，在这类文书，刻意强调一己遭遇之艰困是难免的，上述引文，虚

实皆有。就「虚」的部分而言，欧阳詹任四门助教时，闽人已颇有上京应举者，长安有一个小小的闽士社群，「路无回眸之旧」也许稍夸张。²³在「实」的方面，就闽人在知识界、政界整体力量之微薄，地位之低下，欧阳詹所描述的闽士苦状，甚为可信。关于闽士在八、九世纪之交的边缘地位，还有一则有趣的故事。一位崔姓人士曾向林藻之兄林蕴夸耀他的氏族，林蕴说：「崔杼弑齐君，林放问礼之本，优劣何如邪？」²⁴

即使到了九世纪末，黄滔考进士时，福建士人在科举系统中还是居于明显的劣势。黄滔称自己为「草泽单寒」，「字内迹单，天涯亲老」。²⁵黄滔祭同乡陈峤（825—899）文说，陈峤在僖宗光启三年（887）考取进士，是「振光辉于甲乙，开道路于孤平」。²⁶闽人晚唐中举之艰难，反映在考试时间的漫长。陈峤登第时六十三岁，考了数十载；另一位闽人郑希颜则在昭宗天复元年（901），以「孤平屈人」的身分登进士第，已年愈耳顺。²⁷欧阳詹的孙子欧阳灏出入科场近二十年，未有所成；²⁸黄滔的「表丈」陈黯（似为表叔兼岳父，泉州南安人）考进士十八回未第；²⁹与黄滔并为福建文宗的徐夔（一般写作徐寅），费了十七年才考上进士。黄滔自己也在科场中奋斗二十余年，于昭宗干宁二年（895）登进士第。

黄滔中举，还有曲折。该年发榜后，舆论认为取人伪滥，昭宗皇帝下令重试，落下十人，黄滔仍在榜上。这一事件涉及晚唐贡举被官宦士族把持的问题，昭宗下令重试，就是希望为「寒俊」开路。五代王定保所著的《唐摭言》提及此事，称黄滔为「孤寒」，以实力取胜。³⁰黄滔自己对唐末进士考试中的世家与孤寒之争，也有记述。〈嵩山灵岩寺碑铭〉云：「咸通干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³¹〈司直陈公墓志铭〉则曰：「咸通干符之际，龙门有万仞之险，萑谷无孤飞之羽」。³²闽人虽加入全国性知识界已近一个世纪，仍然属于「平人」、「孤飞之羽」。

晚唐进士考试势家把持的问题，涉及唐代社会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简单地说，大约从玄宗朝开始，原本与关陇集团、文学文化关系较疏的山东士族，为求仕进，大量参加科举考试。往后，士族一直在科举系统占有很大的势力，除了社会地位最高的山东士族，还包括原本与隋唐政权关系较密的关中（包括河东）郡姓。这些旧家与一些在考试制度取得成功的新官宦世家成为科举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九世纪以后，社会上各种新兴力量崛起，福建士人参加科举，就是这个变化的表现，相对之下，士族的社会资源和文化地位都不如前。面对此形势，在政治上占优势的官宦世家（多为北方士族），极力在科举过程中排挤新兴士人，唐末进士旧族出身者，不减反增。³³总结而言，在九世纪下半，福建士人在中央与地方文化最重要的联结管道——科举制度——中力量仍弱，算是孤寒，但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个处境是因他们力量的上升而引起的。闽士在全国知识界的实际地位与影响，与一个世纪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需要注意，福建士人虽然多自称或被指为「孤寒」、「平人」，这只是就他们在全国性知识界中的角色而言，在本地，他们恐多家势富盛，并不清寒。这个问题下节将有所考论。

现在还要作一点补充说明。本文指出，晚唐福建士人在贡举与政府系统中，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这是就大体而言。唐亡以前，还是有个别闽人仕宦显达，晚唐的中央文官体系当然不是完全封闭的。在九世纪前期，林藻曾官至岭南节度副使，陈诒知制诰，漳州漳浦人潘存实累迁户部侍郎，侯官人陈去疾官拜邕管（岭南西道）节度副使。³⁴九世纪晚期，闽县人侯固曾任鄜坊、朔方、义武等节度使，³⁵另一闽县人郑誠历任国子司业、江西节度副使。³⁶此外，欧阳詹的后辈亲戚（约是外孙之属）李贻孙于宣宗大中五年至七年（851—3）任福建观察使。我们不知贻孙的父家是否为闽人，但对照欧阳詹于贞元年间获福建观察使常袞赏识，徇而开闽人进士登第之先路的

往事，六十年后，幼年时曾拜见他的后人竟得任福建观察使，不能不说闽士参与科举，导致了重要的社会后果。³⁷

再来要提出另一项观察。前文说明，晚唐福建士人以「孤寒」之身在科场奋斗，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中举，努力无成的更不知凡几。在考试期间，他们必须不断寻求赏识者，因为唐代进士取人，本来就重声誉。晚唐孤寒士人（包括闽士）应考的特殊形态，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许多人在登第之前，已经全国知名。事实上，有人即使从未登第，也是公认的文坛翘楚，罗隐（833—910）就是最好的例子。再者，参加科举考试的寒士不一定长期待在长安，他们有时会旅游各地，广事干谒交友。晚唐朝廷势弱，藩镇各方雄踞，更增强文士周游求用的动机。在这种态势下，边缘士人与传统全国文化中心长安的关系不若早期紧密，全国性知识界的网络性质更形突出。以下举几个福建士人的例子，以为说明。

黄璞撰有〈王郎中传〉，其中提到乡人李颜，「累举进士，郁有声芳」，³⁸很清楚地显示，考进士的过程，就能使人扬名。罗隐在〈陈先生集后序〉追述他与黄滔「表丈」陈黯的交谊：「陈先生……曩者与予声迹相接于京师，各获誉于进取」，可见两人以举子的身分成名。后来，陈黯屡试不中离京，罗隐还受人之托，在扬州与陈黯相处月余之时，劝他续考进士，陈黯谢绝。³⁹我们不知道陈黯考试期间是否一直住在长安，但从他放弃科举后曾滞留扬州，或许可以推测他在知识界早有广泛的关系。

晚唐五代福建士人的作品大都散佚，传记资料也约略无存，欧阳詹和黄滔是仅有的两个例外，还能稍知生平细节。这里又要利用黄滔的遗文，来显示晚唐全国性知识界似乎包括许多未登第的举子。黄滔〈侯博士圭启〉有言：「滔口讽雄词，心祈藻鉴。在他处则早逾一纪，来上国则已逮二年」，明白讲出，为了追求进士及第，来长安以前，已在别处努力过十二年以上。⁴⁰依文义判断，这里说的「别处」，不止家乡闽中。〈赵起居启〉则自称：「二纪飘零，三朝困辱」。⁴¹据说黄滔考进士共历二十三年，这些话应是将近登第时所写。从黄滔的现存诗文看来，除了长安，他还去过四川、浙东、岭南、江西、湖南、吴地，还在洛阳和襄州考府州试。⁴²他甚至去过久不受朝廷管辖的河北藩镇，〈归思〉云：「蓟北风烟空汉月，湘南云水半蛮边；寒为旅雁暖还去，秦越离家可十年」，〈下第出京〉云：「故疾江南雨，单衣蓟北秋；茫茫数年事，今日泪俱流」，都是明证。⁴³黄滔登第后，短暂停留长安，即回福建，尔后未再以游士身分离闽。文中所记录的游历之处，许多应与应举求名有关。

从德宗贞元年间到唐末，福建士人利用科举、仕宦的管道与全国性知识界建立起广泛的关系，明确无疑。本节最后要考虑的是，除了与中央的关系，闽中士人是否还和其它区域的士人社群有明显的连结？我们可以进一步问：在福建地方与长安中央之间，还有没有一层区域文化中心？这两个问题，是由韩愈〈欧阳詹哀辞〉和李贻孙〈故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引起的。〈欧阳詹哀辞〉曰：

建中贞元闲，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闻詹名闻巷闲。詹之称于江南也久。贞元三年，余始至京师，举进士，闻詹名尤甚。

〈欧阳詹文集序〉则言，欧阳詹在受常袞赏识后，「声渐腾于江淮，且达于京师矣」。⁴⁴德宗朝初年，韩愈随嫂居住今安徽宣城，已听到欧阳詹的名字，并说他在当地闻名已久。李贻孙是欧阳詹的后辈亲戚，所记虽同于韩愈，或许另有来源。案，欧阳詹入京考进士前，未曾离开闽中，他能在江南有名声，似乎显示闽中与江南的士人颇有联系。不过，安史乱后二、三十年，江南的文化

情境比较特殊。当时北方受战乱破坏，士人大量迁往江南。郎士元（？—780？）诗句：「缘溪花木偏宜远，避地衣冠尽向南」，⁴⁵就是这个状况的写照。当时江淮几乎是全国性的文化中心，该地士人可能有特别留心地方才俊的倾向。要了解唐代福建士人是否与邻近区域有特殊的关系，还须考察后期的例子。

关于晚唐闽士与其它地域之关系的资料，现存很少，首先介绍两个晚唐士人移居浙东的案例。第一个是黄子野，侯官人，十三岁时从父至杭州，曾在罗刹江救过浙人王伾，后读书不仕。顺宗永贞元年（805），王伾与王叔文、韦执谊等当权，召子野，亦不出。⁴⁶此外，一位名叫林鼎的侯官人，生于明州，五代时仕吴越。他的父亲林无隐有诗名，流寓明州，当然是在晚唐时。⁴⁷

再者，欧阳詹从子欧阳柅现存文〈移陆司勋沔书〉一篇。其中说：「柅在闽中时，闻阁下之名十年矣」。陆沔家乡是吴中，大约为苏常一带，欧阳柅在福建时长期听到陆沔的名字，显示江南与闽中的士人社群颇有交通。⁴⁸个人还发现一个浙江士人入闽的案例。晚唐著名诗人周朴似为睦州桐庐（今浙江桐庐）人，长居福建，又与睦州诗人方干、李频为诗友。周朴于僖宗干符七年（880）因黄巢之乱，死于福州。他的诗在去世后两年成集，福州长溪人林嵩为之作序。⁴⁹

总结来说，例证虽然少，我们似乎还是可以感觉，在晚唐，福建士人与江南——特别是浙东——知识界之间有相当程度的来往。这个关系有多深，很难判断，因为在文字资料上，士人与中央的交通几乎完全遮掩了区域间的关系。不过，到五代十国，情势发生了变化。在五代后期，福建士人几乎可说有了一个新中央，这就是以金陵、庐山为核心的南唐知识界。

福建士人的本土社会地位

前文曾提及，福建士人虽然在唐代科举活动中属于「孤寒」，在本乡的地位应非如此。中晚唐五代的福建士人社群中，有很明确的家族盘据现象，也就是说，少数家族的成员大量出现在士人活动的核心。这个情况似乎显示，闽士多出身地方盛族。以下将就家族盘据现象具体举证。在举证之前，要作两点说明。第一，为便利读者复核，本文揭示福建士人间的亲属关系，多引明代何乔远的《闽书》，本人已尽量查阅有关唐宋文献，以确定所述无误。第二，为求清楚揭露现象，本节涵盖的范围不限李唐，并及五代，稍涉宋初。

以下是本人所察知的福建士人家族——特别是科举家族：

一、林藻家族，泉州莆田人。

二、欧阳詹家族。泉州晋江人，欧阳詹的父祖历代任官，只是未曾北宦；⁵⁰他的侄子欧阳柅文宗开成三年（838）进士，孙子欧阳灏出入场屋近二十年。福建早期明经蔡沼也是欧阳詹的亲戚。⁵¹

三、周匡业家族。漳州龙溪人，匡业为德宗贞元八年（792）明经，其弟匡物宪宗元和十一年（816）进士，子汉杰元和十三年进士，孙辈间亦有名士。⁵²

四、陈诩家族。福州闽县人，陈诩德宗贞元十三年（797）进士，其子陈纳武宗会昌四年（844）进士。⁵³

五、戴归德家族。龙溪人，归德与其弟添应都是宪宗元和十三年进士，归德的孙子洪宗、曾孙秉权则为南唐进士。⁵⁴

六、侯固家族。闽县人，侯固为文宗大和九年（835）进士，其侄侯岳宣宗大中十二年（858）进士。⁵⁵

七、欧阳袞家族。闽县人，欧阳袞、琳、玘父子三人皆为晚唐进士。⁵⁶

八、林慎思家族。福州长乐人，慎思懿宗咸通十年（869）进士，其子林征僖宗干符二年（875）进士。⁵⁷

九、林嵩家族。福州长溪人，林嵩僖宗干符二年（875）进士，其子揆为建州顺昌县令，移居该地。⁵⁸

十、陈峤家族。泉州莆田人，陈峤僖宗光启三年（887）进士，曾祖、父亲曾任官，兄弟皆长于儒学，从子陈淑哀帝天佑四年（907）进士。⁵⁹

十一、黄滔、黄璞家族。从黄滔文集看来，他的内外亲戚多为儒士文人。其从弟黄璞昭宗大顺二年（891）进士，黄璞有一子进士，多子任职朝廷。⁶⁰

十二、翁承赞家族。福州福唐人，承赞昭宗干宁三年（896）进士，其弟承裕则为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承赞孙翁纬、翁鉴均为宋初进士。⁶¹

十三、江文蔚家族。建州建安人，文蔚系后唐进士，其子江拯、孙江任都是宋初进士，另一孙江翱则为名士。⁶²五代宋初著名文士徐铉所写的江文蔚墓志，明说他家在建安，「世为大姓」。⁶³

十四、阮思道家族。建州建阳人，阮思道为后唐进士，其子昌龄、从子中度都是宋初进士。⁶⁴

十五、杨在尧家族。泉州仙游人，在尧为昭宗天佑二年（905）进士，其子崇鼎是五代晚期（宋已建国）统治闽南的陈洪进的女婿，入宋后官至惠州知州。洪进亦为仙游人，杨家显然是该地势家。⁶⁵

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的资料，存留至今的非常少，从这些仅有的零散信息，我们就侦测到如此明确的家族盘据现象，在当时的社会，少数家族的优势，一定远超出上文所显示者。至于这些家族的背景是什么，优势从何而来，在唐宋之际的变局中命运如何，还有待仔细研究，才可能作具体的推测。就现有资料所知，以上列举的家族中，江文蔚世为大姓，有些先祖早已仕宦，如林藻家、欧阳詹家、陈峤家，绝大多数则完全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士人家族可能起源于某一寒士苦读中举，造福家人，但依常识判断，应该大多原本即有相当的经济资源与社会势力，因为家族现象本身就意味着，个人的成功多依靠家族的既有力量，突然的社会上升是困难的。简单地说，依照表面的观察，从中唐到宋初，福建的士人阶层具有高度的垄断性，情况显然比中央还严重。我们在探考中晚唐的士人历史时，必须区分全国与地方的层次，才能准确了解他们的社会位置。⁶⁶

关于以上的讨论，我们或许还能作两点引伸。首先，晚唐科举中的孤寒与世家之争，经常是新兴地方的盛族成员与全国性官宦世家子弟之间的冲突。其次，晚唐五代士人阶层的变动有两个主要面相：一是中古全国性士族的衰弱瓦解，另一则是地方士人社群的成员大量出现于全国性舞台。不过，这些新兴士人最终并未能形成一个新的、稳定的全国性菁英阶层。以上两点，不算结论，只能当作考虑唐宋社会变迁的假说。

五代闽士的域外关系

黄巢之乱后，唐帝国迅速崩解。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泉州刺史王潮攻陷福州，主宰全闽，福建实质独立。公元九〇七年，朱全忠篡唐，进入五代时期。九二六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王潮之侄延翰自号大闽国王。公元九四五、九四六年，南唐破闽，最后南唐占有建州、汀州，福州归吴越，泉州、漳州则为王氏政权旧将留从效、陈洪进所据。闽地分裂。⁶⁷

唐帝国崩解之时，南方士人多离开中原，归反家乡或投效地方政权，华北不复为全国知识界的中心。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黄河中游数百年的文化与政治权威象征，并没有在短期内

消失。唐哀帝天佑三年（906），唐亡前一年，政局极度混乱之际，仍有两位闽人——陈光义、翁裘明——登进士第，裘明是黄滔的外甥。⁶⁸陈岫的从子陈淑则在次年，唐亡之岁，考上进士。⁶⁹入五代后，福建士人继续在华北参加科举、入仕。以下是一些五代闽人进士的名字，名后列登第的年份：陈沆，后梁开平二年（908）；郑希闵，同前；廖澄，同前；⁷⁰李仁济，后梁干化元年（911）；⁷¹陈逊，后梁贞明某年状元；⁷²黄仁颖，后唐天成二年状元（927，后梁贞明四年（918）明经）；⁷³陈保极，后唐天成三年（928）；⁷⁴江文蔚，后唐长兴三年（932）；⁷⁵杨徽之，后周显德二年（955）。

关于五代闽人在华北应举的现象，要提出一点说明。后梁篡唐后，闽地王氏仍以藩镇自居，承认北方政权的宗主地位，接受封官，朝贡不绝。尤有进者，福建到中原的通路阻绝于统治江淮的吴国，闽地入贡，必须远取海道，到山东半岛登陆，风险甚高，漂溺的事例很多。有资料显示，王氏政权在建立闽国以前，仍然向北方贡士，这应当也是整体进贡体制的一部分。因此，五代参加后梁和后唐科举的闽士，可能大多是由福建赴举，而非移居北地者的后裔。⁷⁷福建何年停止贡士，并不十分清楚，后唐晚期中举的闽人，如江文蔚，或许是福建切断与后唐的归属关系后，留居北地的乡贡进士。无论如何，在五代初期，对福建士人而言，中州似仍有文化中心的地位。公元九三〇年代之后，闽士与华北的文化关系逐渐断绝。在后周进士登第的杨徽之是特殊的个案，他是建州浦城人，在南唐统治下，有志建功中原，特地到开封寻求仕途。⁷⁸

五代前期虽然继续有闽士赴华北考科举，就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而言，这段时期福建士人最明显的举动仍是返回闽中，远离战祸。晚唐两位著名的福建文士——黄滔与徐夔——都在唐亡前夕回乡。关于晚唐五代闽士的归乡，翁承赞的事迹应该很有象征意义。承赞是福州福唐人，昭宗干宁三年进士，两度代表北方朝廷（唐、后梁）到福州封王审知为王。黄滔还为承赞第一次担任册封使的任务（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写下这样的诗句：「衣锦还乡翻是客，回车谒帝却为归」。⁷⁹但翁承赞最后还是返回闽地，终老故里了。⁸⁰

五代前期，闽士基本上处于孤立的状态，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华北只能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但到五代晚期，福建士人与南唐核心区的联系趋于密切。这个变化当然和公元九四六年南唐取建州、汀州有关，但金陵乃至今天江西北部在南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可能也是一项因素。在南唐的闽士可以仕宦与非仕宦两类，分别叙述。

任职于南唐的福建士人有从北方去的，就目前文献所见，有江文蔚、廖澄两个例子。文蔚为建州建安人，词赋极高，原仕后唐，后奔吴国，曾知制造，南唐烈祖（徐知诰、李昪）篡吴后，继续供职于南唐。⁸¹廖澄也是建州人，后梁进士，烈祖时南奔，宋将曹彬攻打金陵城陷后，殉国自杀。⁸²此外，福建后唐进士陈保极在中原任官，后晋时企图南奔未遂。⁸³也算是越鸟南飞的现象吧。

其它任职于南唐的闽士，有先代为唐朝官员，投效杨行密的吴政权，子裔因而出仕南唐的；⁸⁴也有南唐破闽后，转仕南唐者，陈致雍和潘承佑是显例。陈致雍以礼学知名（见后文），潘承佑为泉州晋安人，原仕吴，后来弃官归闽，南唐据建州后，又仕南唐。⁸⁵情况比较特别的是康仁杰。他是泉州人，原出家为僧，喜儒学，至南唐易服入仕，并为后主李煜详言漳、泉近时情状。⁸⁶仁杰的情况与南唐破闽无关，似乎有知识分子向中心地区集结的意味。

五代后期，还有一些福建士人集中在南唐的文化重镇庐山（今江西九江东南）。前文提过一位后梁闽人进士陈沆，后来隐居庐山。另有一位名为陈晁的闽人，在庐山隐居三、四十年，苦思作

诗，文名甚高，多有后进师事景从。⁸⁷南唐在庐山设有国学（即白鹿洞书院前身），建州人朱弼举明经第一，授国子助教，知庐山国学。⁸⁸他的乡人孟贯、杨徽之、江为都曾在此就读。杨徽之后来就北周科举，孟贯也曾往扬州向后周世宗献诗，两人显然都具有强烈的华夏一统思想，这大约也是士人文化的特色。⁸⁹至于江为，就读国学之外，还习诗于陈贶；⁹⁰陈贶的另一弟子刘洞也是闽人。⁹¹福建士人在五代末期集中于庐山，除了文化的吸引力，政治局势应也是重要因素。孟贯、杨徽之、江为、刘洞都出身于南唐治下的建州，当非偶然。

五代时期，闽士也有在其它南方政权任官的，但数目显然比在南唐者少很多。譬如，吴越丞相沈崧（唐昭宗干宁二年（895）进士）是闽县人；吴越获福州后，闽国官员黄延枢及其子彝简投效钱氏政权。史书中还记载有一位舍闽仕吴越的刘甫。⁹²此外，倪曙是侯官人，唐僖宗中和五年（885）进士，避乱归闽，在泉州与徐夔、陈郟等友善；后来岭南，曾为南汉翰林学士、工部侍郎。⁹³

总括而言，五代由于时局的缘故，缺乏稳固的全国性知识社群，福建士人的域外关系也不如晚唐时深广。但在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南唐辖下的金陵和庐山显然成为向外发展的闽士的集结点，值得提出。

福建士人的思想动态

福建士人从八世纪末开始进入全国性的士人圈，他们在中晚唐五代的思想有何特色，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这方面的考察既能展现唐宋思想变动局面中的一个细部，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福建地方士人文化与中央主流的关系。

中国自西汉中叶以下，儒家思想就是士人阶层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士人接受儒家教育，依循儒家的主张，认为自己有治理国家的责任与能力，社会也广泛接受这个观点。唐代取士虽然以诗赋为最高标准，士人参政的理据仍是儒家教义，儒家经典为士人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福建士人文化当然有儒家学术的成分。欧阳詹〈送蔡沼孝廉及第后归闽亲序〉有言：「蔡侯沼字虚中，予之邑人，又懿亲也。虚中以学，予谬以文，共遣乎长吏，皆求试于宗伯」。⁹⁴欧阳詹说蔡沼的专长在「学」，指的就是经学。蔡沼显然是考明经，「孝廉」在唐代为「明经」之代称。又，欧阳詹〈送巴东林明府之任序〉提及，林明府为其乡人，自幼相识，也是明经上第。⁹⁵林氏不知道是否就是晋安林氏的林蕴。林蕴与欧阳詹友好，贞元四年（788）明经，在《新唐书》入〈儒学传〉，据该传，林家「世通经」。⁹⁶依上所述，在欧阳詹的同乡友人中，至少有蔡沼和林蕴擅长经学。欧阳詹自称「薄窥坟籍，适有章句」，⁹⁷看来儒学造诣也不差，只是文才更高，因而得以显大名于唐代知识界。

晚唐五代的福建士人中，最著名的儒学专家是陈致雍。陈氏为莆田人，精通礼学，历仕闽国、南唐，在闽为太常卿，入南唐曾任太常博士。南唐宋初的著名文士徐锴在〈曲台奏议集序〉一文，称陈致雍「遍读七经，尤明三礼」，「礼者所疑，援经以对；酌于古而无悖，施于今而易行」。⁹⁸《曲台奏议集》为陈致雍奏议的结集，其中论礼文字甚多，《全唐文》尚有存留。⁹⁹历仕后唐、吴、南唐的江文蔚也擅礼学，能作仪注。¹⁰⁰此外，福州长溪人林嵩据说唐末曾任毛诗博士，¹⁰¹南唐国子助教朱弼也精究经典。¹⁰²

总结而言，中晚唐五代的福建显然存在着经学传统。不过，经学家的人数不多，似乎透露，闽中的儒学传统并非深厚，这个情况应与该地士人阶层的历史较短有关。如所周知，唐代的文学

风气特别兴盛，远超过经学，诗赋写作是文官考选体系最看重的能力。福建士人凭借贡举制度，在中唐以后进入全国性的士人社群，能文之士自然很多。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文人之中，颇有亲近古文运动的。

唐代在安史乱后，士人思想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士人群中，不断有人要求改革时政民风，重振儒道。这个变化，或许可以简称为「儒家复兴」。一直到九世纪初，儒家复兴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都是一般所谓的「古文运动」。古文诸子贬抑近代重骈俪声律的华美文风，主张文体复古，崇散尚质。从思想史的观点看来，更重要的是，有些古文家主张，文章的目的应在阐明古道，他们积极从事儒家基本理念的探讨。这个潮流到韩愈、柳宗元的出现，达于颠峰。韩、柳的世代以后，儒家复兴的思潮获得士人广泛的接受，逐渐脱离了文章改革的藩篱，成为晚唐至宋初士人文化中的一个新流派。这个流派，无以名之，姑称为「古道派」。福建士人颇有属于此派者。

福建士人最早与儒家复兴发生关系的，非欧阳詹莫属。欧阳詹与韩愈为同年进士，也是好友，对韩愈的思想深有同情。贞元十五年（800），他担任四门学助教时，曾企图率领学生赴朝廷请愿，要求任命韩愈为国子博士。¹⁰³在诗篇〈答韩十八驽骥吟〉，欧阳詹这样描述韩愈：「伊情有远澜，余志逊其源；室在周孔堂，道通尧舜门；调雅声寡同，途遐势难翻」。¹⁰⁴从现存欧阳詹的作品看来，他的行文错落有致，不重骈偶，文学思想似乎与韩愈相距不远。他的〈自明诚论〉从儒家立场讨论心性问题，〈珍祥论〉批评祥瑞观念，都是八、九世纪之交古文或古道派文人关心的重点。¹⁰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明诚论〉主张，除了天生圣人，道德心性的成就，必须透过后天的学习认知，立场与李翱的〈复性书〉相左，不知道这两部作品的写作有无相互关系。欧阳詹去世后，李翱曾替他作传，¹⁰⁶不但证明两人交往密切，更显示欧阳詹是当时新儒家思想圈的成员。

在欧阳詹的后一代，至少有一位服膺韩愈的福建士人。这位是林简言，福州福清人，文宗大和四年（830）进士，曾任漳州刺史。林氏有遗文〈上韩吏部书〉，信中比韩愈为当今之孟轲、扬雄，「得圣人之道，能传说圣人之道」，希望拜他为师。¹⁰⁷这封信也许有期盼与韩愈接近，将来得到援引的用意。不过，其中内容至少显示，他对韩愈的思想是很熟悉的。

晚唐福建还出现了一位儒家思想家——林慎思。他是福州长乐人，懿宗咸通十年（869）进士，黄巢陷长安时为万年县令，不屈死。¹⁰⁸慎思有志撰述，成一家之言，著有《伸蒙子》、《续孟子》，主要关心政治问题，强调养民、薄赋敛、不扰民。¹⁰⁹《续孟子》尤其有思想史的重要意义。中唐儒家复兴的趋势开启后，知识界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孟子得到普遍注意，在儒家传统里的地位大幅提升。当时景仰孟子的主因在于他拒杨墨、捍卫儒道的精神，他的人性思想并未得重视。¹¹⁰林慎思写作《续孟子》，要发挥孟子未尽之意，显然是受儒家新思潮的影响。他尊崇孟子，大概由于政治观念相近，与心性问题的全无牵涉。

关于晚唐福建士人与古道或古文思潮的关联，还有几则重要的记载。《唐摭言》卷五云：

陈峤谒安陆郎中郑誠，三年方一见。誠从容谓峤曰：「识闵廷言否？」峤曰：「偶未知闻。」誠曰：「不妨与之还往，其人文似西汉。」¹¹¹

陈峤和郑誠前文都曾出现，皆闽人。郑誠是武宗会昌二年（842）进士，陈峤于僖宗光启三年（887）中进士第。郑誠是陈峤的乡先辈，陈去拜访郑，当然有希望得到援引的意思。郑誠在晚唐闽士圈中，似乎颇有地位，黄滔也曾受其教恩；¹¹²郑誠说闵廷言「文似西汉」，明显是遵奉古文运动的标准。巧合的是，黄滔称陈峤，「其所为文，扣孟轲、扬雄户牖」，看来陈峤也是新思潮中人，只

是不知是否曾受郑誠影响。¹¹³至于闵廷言是谁,《唐摭言》卷六记载:

闵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绝。咸通中,初与来鹄齐名。王綦尝谓同志曰:「闵生之言,酷似西汉。」¹¹⁴

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首先,王綦对闵廷言的评语和郑誠完全一致。王綦也是福州人(福清),懿宗咸通三年(862)进士。¹¹⁵看来,对廷言文章的推重,是许多晚唐闽士的共同见解,王綦的「同志」中大概也有福建同乡。其次,闵廷言是豫章人,来鹄也是;豫章即今江西南昌,来鹄以学韩柳文知名宣、懿宗年间。¹¹⁶这些讯息不但再次证实,闵、来、郑、王、陈等人都是韩柳古文运动的余绪,似乎还透露,在五代以前,福建与江西士人已有亲近的关系。

在福建士人与儒家新思潮的接触上,盛均和陈黯也值得注意。盛均是泉州晋江人,宣宗大中十一年(857)进士,今存文章共五篇,其中四篇的主旨都在政事风俗,表现强烈的治世之心。譬如,〈人旱解〉把旱灾分为天旱、国旱、人旱,强调灾害的人为因素。「国旱」是由君主不仁造成的。至于「人旱」,盛均说:「邦毁其政,吏贼其行,千里人心,燥不为阴。……人旱求诸政,政清而民阜。今货游其上,刑黷于下,百姓焦愁,结成恨暑。所谓人旱也。」¹¹⁷四篇政论之外,另一文〈孔子历聘解〉,解释孔子行事的意义,也在宣扬儒道。

陈黯现存文章十篇,无论从文风或题旨看来,和罗隐一样,明显属于「古道派」。他的遗文都使用散体,性质则多为政治、文化评论。其中有一篇〈禹诰〉,属于唐代流行的续经或补经的体例,内容是代禹立言,解释何以他的帝位最后传给启。¹¹⁸晚唐五代福建士人的作品,尤其是文章,遗留至今的很少。即使如此,我们已看到不少属于「古道派」的例子。依此判断,晚唐五代士人与新儒家思潮的联结应该是相当深的。

在文风与文学思想的发展上,福建士人也有表现。唐末五代,福建产生了两位重要的作家:黄滔与徐夔。黄滔前文已提过,是晚唐五代的一位南方文宗,他在文学思想上,推崇古文。在〈与王雄书〉,黄滔说:「俚偶之辞,文家之戏也」,又称赞王雄:「近日场中,或尚辞而鲜质,多阁下能揭元次山、韩退之之风」,¹¹⁹有文学批评史家将其归为儒家功利主义一派。¹²⁰不过,细究黄滔的行文,其实骈俪的成分不轻,显然受到晚唐以后骈体文复兴的熏染。徐夔也是莆田人,唐昭宗干宁元年(894)进士,五代时多隐居泉州。徐夔以作赋知名,为一美文家。讲究骈俪辞藻是晚唐到宋初文坛的一个重要潮流,徐夔固身在其中。¹²¹

总结来说,从福建士人的思想动态,我们可以看到中晚唐五代俗世知识界的各个主要方向。大体上,闽中士人以文学见长,经史之学较乏表现。福建文士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色是,颇有人服膺安史乱后出现的新儒家思潮。这一方面显示了儒家复兴潮流坚韧的力量,在韩愈、柳宗元的世代之后,仍然绵延不绝,并向南方散播。另一方面或许也意味,新兴的士人社群容易受到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余论

本文对于唐德宗朝以下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过程作了大体的描述,并检视在此过程中闽士的思想情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求了解,一个地方性的知识社群如何发展成为全国性士人阶层的一部分,这样的发展有何重要历史涵义。本文获得的结论是,科举制度是沟通地方性与全国性士人社群的最重要管道,在唐亡前一个多世纪,闽士在此管道备受压抑,一直只有「孤寒平人」的身分。这个景况一方面反映了福建士人作为新兴社群的边缘地位,但另一方面,他们以及其它南方新兴地域士人受到压制一事,事实上显现了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力量的茁壮。唐帝国崩解后,这个

形势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本文也设法探讨，在地方性与中央性士人社群之间，有无介于两者之间的区域文化中心。个人发现，闽士虽然与邻近地域如浙东、江南、江西有较密切的接触，区域士人文化层的存在并不明显。这个现象似乎显示，唐代以后，科举与文人仕宦制度对中国士人社群的结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开端曾经表示，在中国中古时期，知识阶层并不限于士人，由于题旨与研究规模的限制，本文无法探究佛僧与道士的社群结构。现在只能以福建的禅宗僧人为例，对这个问题稍作说明，并与士人阶层的情况作对照，以为结语。

晚唐佛教以禅宗为最盛，禅宗起于南方，晚唐五代福建佛教因之以禅宗为主，是情理中事。从知识阶层史的观点看来，福建禅宗的发展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特点。首先，重要僧人的出现，与闽士进入中央性社群的时间差不多，都在八世纪后半。禅宗史上，最早的著名闽籍禅师是百丈怀海（740—814）。怀海为福州长乐人，在衡山受具足戒，代宗大历年（766—779）初，在南康（今江西南康）参谒马祖道一，嗣其法，成为道一的重要传人。马祖去世后，长住新吴（今江西奉新）百丈山，以制定禅门法规闻名。¹²²闽籍的其它早期禅僧大约都与怀海同时或稍后，其中也有马祖的弟子。¹²³

其次，禅宗社群有很鲜明的区域色彩。晚唐福建禅僧是以江西、湖南（特别是江西）为求法中心。事实上，早期重要僧人大都驻锡外地，不归闽中。除了前举的百丈怀海，黄檗希运（？—850？）长驻江西洪州高安黄檗山，也是明显的例子。¹²⁴福建本地的禅宗，要到唐末才开始兴盛，福州的雪峰义存（南安人，822—908）与玄沙师备（福州人，835—908）尤其是两大领导者。¹²⁵即使在五代，福建佛教已自成中心，闽中禅僧到邻近地域如浙江、广东、江南、江西、湖南访法驻锡的，仍颇有所见。简单地说，福建禅宗的兴起，是以邻近的禅教中心为依归点，与士人社群的结构大不相同。这当然是因为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后者则大受国家制度与利禄之途的影响。科举制度虽然压抑了区域士人文化圈的形成，但在经历长时间后，仍促使福建士人由一个纯地方性社群转化为全国性菁英的重要部分，只是这个结局要到宋初才明朗起来。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the Social Cultured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Periods of the Middle-Lat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ies

Chen Jo-shui

(Institutu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TaiWan)

Abstract:This paper id to examine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tratum of the cultured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Periods of the middle—lat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the scholars in Fujian Province experienced.The writer is in the hope to reveal the featers of the social stratum of the cultures in Fujian Province of the time and the integr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as well.The waiter draws

conclusions from his observations:(1)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by far the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local and the central scholars gettings to known to each other.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fall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humble common people showing their marginal status in the rising social groups of schola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The fact the scholars of Fujian and other southern provinces were held back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also realizing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tratum of the cultured in these regions,though.(2)The fact that there existed no regional cultural centre of intermediary nature evidenced th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after the late Tang dynasty wer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upon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groups of scholar.(3)The scholars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middle-late Tang dynasty were deemed highly of the then Neo-Confucianism.

Key Words: the social stratum of the cultured in Fujian Provinc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收稿日期: 2000-04-25

作者简介: 陈弱水 (1956--), 男 (汉族),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与唐史研究。

¹ 贾志扬 (John Chaffee), 《宋代科举》(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95), 页 198-200, 289-90。本书是作者旧着之中译, 原书名为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² 徐松, 《登科记考》(京都: 中文出版社景印, 1982), 卷十二, 页 28a-b; 卷十三, 页 1a-2a。

³ 关于唐代闽人参与科举考试, 最有系统的研究是冻国栋, 〈唐代闽中进士登场与文化发展管见〉,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十一期 (1991年6月), 页 157-66。不过, 此文有若干错误, 最严重的是指中唐古文名家贾至为福州长乐人。按, 贾至确实以长乐为郡望, 但在中古时代, 名叫长乐的地方有好几处。从贾至曾受封信都县伯一事看来, 他的祖乡长乐应该在今河北冀县。此地十六国时期以后为长乐郡, 隋代为信都郡长乐县, 唐代则改称信都县, 属冀州。参考陈弱水, 〈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 在《郑钦仁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台北: 稻乡出版社, 1999), 页 204。又, 闽人在中宗时代已有进士之事, 韩愈集的宋人注已指出。见韩愈, 《韩昌黎全集》(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景印, 1977), 卷二十二, 〈欧阳生哀辞〉注。本文所引的个例, 可见徐松, 《登科记考》, 卷四, 页 26a; 卷九, 页 25b。

⁴ 《新唐书》(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卷六〇, 页 1625。

⁵ 黄氏两文都见于《唐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五, 《全唐文》(台北: 大通书局景印, 1979)卷八二四。

⁶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78), 卷七, 页 192。

⁷ 韩愈, 《韩昌黎全集》, 卷二十二。

-
- ⁸ 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八。此文亦收入《全唐文》卷五九六，但删去欧阳詹的自注，并有其它错误。
- ⁹ 〈与王式书〉称这位刺史为「故中书舍人薛公」。关于此人的名字，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四册，页1927。
- ¹⁰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页832。
- ¹¹ 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卷九（《全唐文》卷五九六）。
- ¹² 关于席相，参考郁贤皓，《唐刺史考》，第四册，页1928。
- ¹³ 陈翊的资料，见《新唐书》，卷六〇，页1611；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四，页13b。
- ¹⁴ 蔡沼的资料，见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卷十，〈送蔡沼孝廉及第后归闽覲省序〉（《全唐文》卷五九六）。明代何乔远的《闽书》称蔡沼贞元中登进士，似乎不确。见何乔远，《闽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卷八一，页2438。
- ¹⁵ 独孤及，《昆陵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九；《全唐文》，卷三九〇。《唐语林》提及独孤此文，称「李椅」为「李锜」。案，李锜为德宗贞元末年财臣，从未任福建观察使，此说误。见王谔，《唐语林》（北京：中华书局，1978），卷四，页140。另参考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并考证》卷六，在《二十五史补编》（台北：开明书店，1959），第六册，页155。
- ¹⁶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五，页740。
- ¹⁷ 〈睦州刺史府君神道碑〉不见于任何主要的唐代文献总集。此处的叙述系参考徐松，《登科记考》，卷九，页25b所引。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页602亦引此文，据称载于《林邵州遗集》。林邵州应即林蕴（曾任邵州刺史），此书不知藏于何处。在陶敏书中，林文题作〈睦州刺史二府君神道碑〉，「二」大约是衍字。林万宠的职位，有两种说法。《登科记考》引〈睦州刺史府君神道碑〉说是饶州刺史（治所在今江西鄱阳）；《直斋书录解题》则称饶阳郡守，即深州刺史（治所在今河北饶阳）。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页454。从引文看来，也许《登科记考》的说法是正确的。
- ¹⁸ 据《直斋书录解题》所引林蕴为其父所撰之墓志。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页454。
- ¹⁹ 关于唐代福建州县属官的任用制度，学界了解很少。这方面最重要的概括性史料有两条。一是杜佑《通典》卷十五：「黔中、岭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补，御史一人监之」；一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总章二年（669）：「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这两种办法都不经吏部，但实质不同。前者是由中央派员前去主持铨选，即一般所谓的「南选」；后者则是地方长官径自选任。以上所引史料，见《通典》（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册一，页360-1；《资治通鉴》（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页6362。一般讨论「南选」，以岭南、黔中为主，较少涉及闽地。参考张泽咸，〈唐代「南选」及其产生的社会前提〉，《文史》，第二十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77-90；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页89-101。需要说明，以上所论，绝不意谓唐代福建所有地方、所有时期的州县属官都不经吏部任命。这里只是说明，唐代福建有南宦、北宦的问题，尤以前期为甚。
- ²⁰ 见欧阳詹，〈有唐故朝议郎行鄂州司仓参军杨公墓志铭〉，《欧阳行周文集》，卷四（《全唐文》

卷五九八)。

²¹ 《欧阳行周文集》卷八(《全唐文》卷五九六)。

²² 参考孟简,〈咏欧阳行周事并序〉,《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卷四七三,页 5369。

²³ 参考冻国栋,〈唐代闽中进士登场与文化发展管见〉,页 161;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五,页 1b。

²⁴ 《新唐书》,卷二〇〇,页 5720。

²⁵ 黄滔,《莆阳黄御史集》(天壤阁本),下秩,〈与杨状头书〉(《全唐文》,卷八二三);《唐黄先生文集》,卷七,〈南海韦尚书启〉。

²⁶ 《唐黄先生文集》,卷六,〈祭陈侍御峤〉(《全唐文》卷八二六)。

²⁷ 王定保,《唐摭言》(台北:世界书局景印,1962),卷八,页 90-1。

²⁸ 同上,卷十,页 108。

²⁹ 黄滔与陈黯的亲戚关系,参考《唐黄先生文集》卷六〈祭先外舅文〉(《全唐文》卷八二六);卷七〈与罗隐郎中书〉;卷八〈颖川陈先生集序〉(俱见《全唐文》卷八二四)。

³⁰ 参见《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二〇下,页 800;《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卷六〇,页 811;王定保,《唐摭言》,卷七,页 74;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四,页 9a-14b。

³¹ 《唐黄先生文集》卷五(《全唐文》卷八二五)。

³² 《唐黄先生文集》卷六(《全唐文》卷八二六)。

³³ 参考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1986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初版),页 340-9,365-71;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第十一、十二章;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页 339-6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先生文集》第三册(台北:里仁书局景印,1982),页 79-81。

³⁴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页 454(林藻);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卷十一,页 569(潘存实);《淳熙三山志》(在北京中华书局景印《宋元方志丛刊》第八册,1990),卷二六,页 2b(陈诩),3a(陈去疾)。

³⁵ 《淳熙三山志》,卷二六,页 3a;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页 563,579,729。

³⁶ 《新唐书》,卷六〇,页 1608。

³⁷ 李贻孙的生平资料甚残缺,可参见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六,页 767;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并考证》卷六,在《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页 158;李贻孙,〈欧阳行周文集序〉,在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集首。

³⁸ 《全唐文》,卷八一七。

³⁹ 罗隐,〈陈先生集后序〉,收在雍文华校辑,《罗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杂着》,

页 311-2;《全唐文》，卷八九五。

⁴⁰ 《唐黄先生文集》卷七（《全唐文》卷八二三）。

⁴¹ 《唐黄先生文集》卷七（《全唐文》卷八二四）。

⁴² 参考《全唐文》卷八二三，〈与杨状头书〉；卷八二四，〈与蒋先辈启〉（《唐黄先生文集》卷七），〈（段先辈）第二启〉（《唐黄先生文集》卷七）；卷八二六，〈祭先外舅文〉（《唐黄先生文集》卷六）；《全唐诗》，卷七〇五、七〇六。

⁴³ 黄滔另有诗〈塞上〉两首、〈塞下〉、〈出关言怀〉，不知是否去过西北边地。黄诗分见《唐黄先生文集》卷三、四（《全唐诗》卷七〇五、七〇六）。

⁴⁴ 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集首。

⁴⁵ 〈盖少府新除江南尉问风俗〉，《全唐诗》，卷二四八，页 2787。

⁴⁶ 周祖谟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 676「黄子野」条（陈尚君撰），据《坚瓠壬集》卷一引《榕荫新检》。

⁴⁷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八六，页 1248。

⁴⁸ 姚铉，《唐文粹》（四部丛刊初编本），卷八九；《全唐文》，卷七六〇。参考《新唐书》，卷二〇三，页 5787。

⁴⁹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一四，〈周朴诗集序〉，页 7b-8b（《全唐文》卷八二九）；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 103-11（周祖谟、吴在庆撰）。林嵩存诗仅一首，题为〈赠天台王处士〉，也可左证他与浙江士人的交往。见《全唐诗》，卷六九〇，页 7924。

⁵⁰ 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二十二，〈欧阳生哀辞〉。

⁵¹ 参见何乔远，《闽书》，卷八一，页 2438-9；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卷十，〈送蔡沼孝廉及第后归闽覲亲序〉（《全唐文》卷五九六）。

⁵² 何乔远，《闽书》，卷一一七，页 3515-6。

⁵³ 同上，卷七二，页 2108-9。

⁵⁴ 同上，卷一一七，页 3515。

⁵⁵ 同上，卷七二，页 2109。

⁵⁶ 同上。

⁵⁷ 同上，卷七七，页 2300。

⁵⁸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页 55-60（周祖谟、吴在庆撰）。

⁵⁹ 黄滔，〈司直陈公墓志铭〉，《唐黄先生文集》卷六（《全唐文》卷八二六）；何乔远，《闽书》，卷一〇五，页 3158。

⁶⁰ 何乔远，《闽书》，卷七五，页 2204。

-
- ⁶¹ 同上，卷七九，页 2383，2385。
- ⁶² 同上，卷九五，页 2852-3，2856-7。《闽书》说江文蔚是建州建阳人，但文蔚的墓志以及宋代文献都指他是建安人，《闽书》似误。见下注以及陆游，《南唐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景印，丛书集成新编），卷十，页 224。
- ⁶³ 徐铉，《徐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十五，〈唐故左谏议大夫翰林学士江公墓志铭〉（〈全唐文〉卷八八五）。
- ⁶⁴ 《闽书》，卷九五，页 2853。
- ⁶⁵ 《仙溪志》（在北京中华书局景印《宋元方志丛刊》第八册，1990），卷四，页 5a。
- ⁶⁶ 佐竹靖彦曾对唐宋之际福建的豪族阶层有所考论，特别重视建州地区的外来移民以及王潮、王审知所带来的光州固始集团，并涉及福建本地的非汉原住民。青山定雄早期研究五代、宋时期福建的新兴官僚，也很注意光州固始人士与其它外来移民。参见 Sadao Aoyama, "The Newly-Risen Bureaucrats in Fukien at the Five-Dynasty-Sung Perio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Genealogie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21 (1962), pp. 1-48; 佐竹靖彦，〈唐宋时期福建 家族 社会—闽王朝 形成 科举体制 展开 一〉，《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页 371-419。福建士人社群与这些势力有何关系，还有待探讨。
- ⁶⁷ 诸葛计、银玉珍编着，《闽国史事编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⁶⁸ 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四，页 31b；黄滔，〈送外甥翁袭明赴举序〉，《莆阳黄御史集》上秩（《全唐文》卷八二四）。
- ⁶⁹ 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四，页 32b。
- ⁷⁰ 同上，卷二五，页 2a。
- ⁷¹ 何乔远，《闽书》，卷八一，页 2441。
- ⁷² 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五，页 7a。
- ⁷³ 同上，卷二五，页 7a，17b。
- ⁷⁴ 同上，卷二五，页 21b。
- ⁷⁵ 同上，卷二五，页 37b。
- ⁷⁶ 同上，卷二六，页 28a-b。
- ⁷⁷ 关于五代闽地对中原政权的朝贡关系，参见日野开三郎，〈五代闽国 对中原朝贡 贸易〉，《史渊》，第二十六辑（1941）；第二十七辑（1942）。贡路的讨论，见第二十六辑，页 20-26。闽地贡士的资料，则见于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年初版；台北：明伦出版社景印，1971），卷四〇七，页 3295 引《稽神录》。
- ⁷⁸ 杨亿，《武夷新集》（台北世界书局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卷十一，〈故翰林学士正奉大夫尚书兵部侍郎杨公行状〉，页 18b-19a。
- ⁷⁹ 《唐黄先生文集》卷三，〈送翁员外承赞〉（《全唐诗》卷七〇五）。

- ⁸⁰ 翁承贇生平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页 349-56；诸葛计、银玉珍编着，《闽国史事编年》，页 50-1，79-80，96。
- ⁸¹ 徐铉，《徐公文集》，卷十五，〈唐故左谏议大夫翰林学士江公墓志铭〉（《全唐文》卷八八五）；马令，《南唐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景印，丛书集成新编），卷十三，页 92；（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五，页 350-3。
- ⁸²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七，页 391。
- ⁸³ 《旧五代史》，卷 96，页 1272。《十国春秋》卷三一说，陈保极与弟元亮同任官南唐，后主称为「二英」。这份资料不知根据为何，恐误。见（清）吴任臣，《十国春秋》，页 449-50。
- ⁸⁴ 游恭、游简言父子为此例。见陆游，《南唐书》，卷六，页 131-3；马令，《南唐书》，卷十，页 72-3；（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一，页 153；卷二一，页 307-8。
- ⁸⁵ 陈致雍见下。潘承佑见马令，《南唐书》，卷十，页 71-2；（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六，页 1386-7。承佑致仕后隐于江西洪州西山，未归闽。
- ⁸⁶ 马令，《南唐书》，卷十四，页 98；（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一，页 448。
- ⁸⁷ 马令，《南唐书》，卷十五，页 103；陆游，《南唐书》，卷七，页 157-8；（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九，页 419-20；卷三一，页 448-9。
- ⁸⁸ 马令，《南唐书》，卷十九，页 153；（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九，页 415。庐山在唐代已久为私人讲学修业的集中地。参见黄玫茵，《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1996），页 171-85。南唐并不常行贡举，朱弼明经登第，似乎是很特别的事。参考陆游，《南唐书》，卷十，页 232-3。
- ⁸⁹ 孟贯生平事迹及有关资料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页 494-7（周祖谟、贾晋华撰）。孟贯见周世宗，目的应在求官。不过，据《江南野史》等书记载，孟贯的献诗〈赠栖隐洞谭先生〉有句「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被世宗认为有讥诮其征江南之意，引起他的不悦，仅赠孟贯以进士虚名。孟贯存诗计三十一首，在《全唐诗》卷七五八，佛道倾向相当浓厚。杨徽之到后周举进士之事，已见前。徽之入宋后历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名于时。见《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二九六，页 9866-9。
- ⁹⁰ 江为生平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页 498-504（周祖谟、贾晋华撰）。
- ⁹¹ 马令、陆游的《南唐书》都说刘洞是庐陵人，龙衮《江南野史》则称他「世居建阳」。案，南唐晚期建州武装领袖陈德诚有诗句：「建水旧传刘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前句指刘洞，因其有诗〈夜坐〉，「建水」则是流经建州的建江。夏江城指夏宝松，庐陵人，习诗于陈颙或江为，庐陵城南有螺川驿，与德诚后句的描写相符。陈德诚出身建州统治家族，称人同乡，不应有错，刘洞显然是闽人。刘洞卒于庐陵吉阳山，这可能是误传他为庐陵人的来由。以上讨论，参考马令，《南唐书》，卷十二、十四；陆游，《南唐书》，卷十二、十五；龙衮《江南野史》（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景印，丛书集成新编），卷五、九；《全唐诗》，卷七九五，页 8954；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页 501-2。
- ⁹²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五，页 1241（刘甫）；卷八六，页 1245-6（沉崧）；卷八七，页 1261（黄延枢父子）；（题）范垫、林禹，《吴越备史》（光绪二十一年钱塘丁氏嘉惠堂刊本），卷二，页 9（沉崧）。

- ⁹³ 参见钱易，《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1958），丙，页31；《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六五，页811；〔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六二，页890。
- ⁹⁴ 《欧阳行周文集》卷十（《全唐文》卷五九六）。
- ⁹⁵ 同上，卷九（《全唐文》卷五九六）。
- ⁹⁶ 现存欧阳詹诗中，有三首提及林蕴，两人并曾同往四川。见《全唐诗》，卷三四九，页3899（〈玩月并序〉），3909（〈蜀门与林蕴分路后屡有山川似闽中因寄林蕴蕴亦闽人也〉），3911（〈与林蕴同之蜀途次嘉陵江认得越鸟声呈林林亦闽中也〉）。亦见《欧阳行周文集》，卷二、三、九。林蕴的传记见《新唐书》，卷二百，页5719-20。
- ⁹⁷ 《欧阳行周文集》卷八，〈与王式书〉（《全唐文》卷五九六）。
- ⁹⁸ 《全唐文》，卷八八八。
- ⁹⁹ 《全唐文》，卷八七三、八七四。关于陈致雍精通礼学一事，尚可见孙望辑录，《全唐诗补逸》，卷一六，韩熙载〈赠陈郎〉注引〈江南余载〉，在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上册，页266。
- ¹⁰⁰ 马令，《南唐书》，卷十三，页92；〔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五，页350。
- ¹⁰¹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页59。
- ¹⁰² 马令，《南唐书》，卷十九，页153。
- ¹⁰³ 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二十二，〈欧阳生哀辞〉。《新唐书》欧阳詹本传说他确实进行了此事，应该是错误的。见《新唐书》，卷二〇三，页5786-7。
- ¹⁰⁴ 《欧阳行周文集》卷三（《全唐诗》卷三四九，页3900）。
- ¹⁰⁵ 《欧阳行周文集》卷六（《全唐文》卷五九八）
- ¹⁰⁶ 此文已不存，此事则记于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二十二，〈欧阳生哀辞〉。
- ¹⁰⁷ 姚铉，《唐文粹》，卷八六（《全唐文》卷七九〇）。
- ¹⁰⁸ 林慎思生平大要可见林永，〈唐水部郎中伸蒙子家传〉，在林慎思，《伸蒙子》（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新编）。林永为林慎思的十三世孙，南宋末人。
- ¹⁰⁹ 林慎思思想的介绍，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先生全集之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第十二章第四节。
- ¹¹⁰ 参考 David McMullen,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10-2; 江政宽，《皮日休的生平与思想一兼论其在唐宋之际思想变迁中的角色》（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第六章第二节。
- ¹¹¹ 王定保，《唐摭言》，卷五，页56。
- ¹¹² 黄滔诗〈下第东归留辞刑部郎中郑郎中誠〉：「万里家山归养志，数年门馆受恩身」（《唐黄先生文集》卷三）。另一曾中进士的闽中后辈林宽亦与郑誠有来往。见林宽，〈陪郑誠郎中假日省中寓直〉，《全唐诗》，卷六〇六。晚唐名诗人郑谷（848?-909）称郑誠为从叔。郑谷乃今江西宜春人，「从叔」是对同姓前辈客气的称呼，不可执实。参见郑谷，〈从叔郎中誠……

因有寄献)，傅义校注，《郑谷诗集编年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页63。「诚」当是「誠」字之误。

¹¹³ 《唐黄先生文集》卷六，〈司直陈公墓志铭〉（《全唐文》卷八二六）。

¹¹⁴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页113-4。

¹¹⁵ 黄璞，〈王郎中传〉，《全唐文》，卷八一七；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三，页1b-2b。

¹¹⁶ 关于来鹄，见《唐摭言》，卷十，页113；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八，页429-30（梁超然撰）。

¹¹⁷ 姚铉，《唐文粹》，卷四六（《全唐文》卷七六三）。

¹¹⁸ 见姚铉，《唐文粹》，卷四五（《全唐文》卷七六七）。参考吕武志，《晚唐五代散文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9），页68-74。

¹¹⁹ 《唐黄先生文集》卷七（《全唐文》卷八二三）。

¹²⁰ 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页663-8。

¹²¹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卷十，页289-300（周祖谟、贾晋华撰）；周祖谟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页645「徐寅」条（吴在庆撰）。

¹²²¹²² 陈诩，〈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全唐文》，卷四四六；赞宁，《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十，页236-7；道原，《景德传灯录》（台北：汇文堂出版社景印，1987），卷六。

¹²³ 铃木哲雄，《唐五代禅宗史》（东京：山喜房佛书林，1985），前编第二章〈福建禅宗〉，页83-4。铃木系研究禅宗地域史的权威，但此书论马祖道一的闽籍弟子，未提及怀海，不知何故。又，铃木的研究，以个别地域为主，对地域间的交通关系，措意较少。

¹²⁴ 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页528。

¹²⁵ 参见铃木哲雄，《唐五代禅宗史》，前编第二章〈福建禅宗〉。